



阅读日本
书系

日本的社会与文化

「日」井上俊 伊藤公雄 编著

张文颖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每川日中友好基金

The Sasakawa Japan-China Friendship Fund



阅读日本
书系

日本的社会与文化

[日] 井上俊 伊藤公雄 编著
张文颖 译

每川日中友好基金
The Sasakawa Japan-China Friendship Fund



世界知识出版社

NIHON NO SHAKAI TO BUNKA

Copyright © 2010 by Shun Inoue, Kimio It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SEKAISHISOSHA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的社会与文化 / (日)井上俊, (日)伊藤公雄编著; 张文颖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012-4879-7

I. ①日… II. ①井… ②伊… ③张… III. ①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G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5776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6835号

丛 书 名 阅读日本书系

书 名 日本的社会与文化

编 者 [日]井上俊 伊藤公雄

译 者 张文颖 译

出 版 者 世界知识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罗养毅 李 刚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陈可望

照 排 北京世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15印张 208千

版次印次 2015年4月第一版 2015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2-4879-7

原书书号 ISBN 978-4-7907-1486-6

定 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社会学的创立者之一、艾弥尔·涂尔干在其1897年出版的著作《自杀论》的序文中写道，“10年前无人问津，完全不受关注”的社会学现已“变成一门流行的学问”。之后，社会学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成果。以解说基本文献的形式总结这些知识目录，正是本计划的初衷。

不过，社会学涉及范围极广，同时还无法忽视其他各学科对社会学的影响。虽然都统称为“基本文献”，但是如果范围取得过大，文献的数量也就随之增多，因此，本系列从中选取了约280篇文献。筛选过程中，我们考虑到了每篇文献的历史意义以及现阶段受到的评价，同时咨询了多位专业人士。但是，最终还是两位编者的喜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学术界迎来了转型期，变化无常。社会学当然也不例外。但是，迄今为止累积的知识却不容忽视。换言之，正因为身处转型期，才更加突出了基础的重要性。这与排练、运动、武术如出一辙，倘若基础不扎实，就无法取得进步。而且，能力上升到某种程度后仍然回顾基础本领，反而更有益于进一步的提高。与其说“转型期”不需要基础，倒不如说这刚好是探索新方法、活用基础的时期。

由于本系列具有学术性质的关系，我们对撰稿者的文章提出了诸多要求。尽管如此，各位撰稿者欣然接受我们的无理请求，突破眼前的阻碍，撰写出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文章。我们由衷感谢各位付出的努力。

2005年夏天，我们首次与世界思想社编辑部商讨本系列的

企划。迄今为止，编辑部的多位工作人员给予了许多帮助和支持。现在，企划成功地以书的形式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在此，谨向各位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编 者
2008年7月

目 录

序 言	1
1 自然村的精神	1
2 作为同族集团的家联合	11
3 家族制度意识形态	20
4 业绩主义的家社会	29
5 近代化的阴影	38
6 日常经验的历史	48
7 近代化与宗教	57
8 近代化内生的原因	66
9 通俗道德的作用	75
10 近代的知识社会学	85
11 美意识“粹”	94
12 耻文化	103
13 都市平民生活	112
14 丰富的生活志	121
15 社会层面上的工薪阶层	130
16 集团形成的原理	139
17 “撒娇”	148
18 成熟的戏剧	157

19	消费社会中的自我	166
20	日本人论的家谱	174
21	日本的政治思想	183
22	投向亚洲的目光	192
23	沉默的权力构造	201
24	象征天皇制	210
25	外国居住者	219

注 意

· 每章正文（Ⅰ－Ⅲ）和文摘中摘自日译本的引用内容可能会根据上下文意思加以修改。

1 自然村的精神

铃木荣太郎《日本农村社会学原理》^①

I

1930年代初期，铃木荣太郎将目光投向处于恐慌状态的日本农村，深感自然村正逐渐走向消亡，并对农村政策家习惯以领导者的姿态对待困苦的农民一事感到担忧。于是，铃木认为，为了实现“农村的健康发展”、树立“农村的正确指导”，农村社会学必须摆脱零散状态，建成独立体系。他甚至提出了“只限日本”、“只限农村”、“聚焦眼前”等三个严格的限制条件，历时15年，撰写了《日本农村社会学原理》这一著作。

实事求是的学风尚未形成之际，铃木试图开辟一个全新的领域，从一而终地坚持如下科学观：崇尚科学在具有追求普遍性的“惰性”，但从“对现状的一定理解以及今后的指导的意义上”来说，舍弃这种崇尚普遍性对社会科学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铃木1968/I：23）。铃木的这一学术观点以巨作《日本农村社会学原理》的形式问世，与《都市社会学原理》、《国民社会学原理笔记》（遗稿）合称为三部曲。

该书分别由社会学论·方法论（第1、2章）、基本地域社会的结构素描（第3章）及其详述（第5、6、7、8章）以及该结构的动态展开（第9章）等3层构成。第4章“农村的家族以及家族本位制”是独立的家族结构·生活律动论，围绕村落类型展开的第10章可以视为“附论”。

^① 铃木荣太郎《日本农村社会学原理》时潮社，1940；铃木荣太郎著作集Ⅰ·Ⅱ，未来社，1968。

铃木在第3章中概括了日本农村的社会结构，指出日本农村的“社会化的单位”（或社会结构的“核心结构”）正是村与家。地缘结合的基础上衍生出了这种社会纽带的直接结合，村（自然村）是一个社会统一体，它具有固定的集体社会意识，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约束着村民。在自然村内，村民们通过个人体验，甚至通过建立各种集团来营造社会过程。铃木在“集团积累式统一的形态”中提出了自然村发挥作用的事实根据。

积累的各类集团一般分为相同生活圈的重合（第一社会地区=小字、组）和既有同一又有分歧，但不超出一定地域的重合（第二社会地区=部落、大字）。这两个生活圈均成立于幕藩制时期，加上后来发展成行政町村的集团（第三社会地区=自然村的联合），三者共同构成了3层积累地区。铃木认为，自然村并不只是停留在各类集团和各种关系的积累和堆积，而是由独自的社会意识统一而成的自足·自律性组织。

铃木规定，不能单纯从抽象的社会结构概念上去把握村，它是由具有各种体系化水平的“集团”、个人间的社会结合即“社会关系”、村民的关系圈即“社会圈”等三种社会构成的关系结构。换言之，这是通过实地调查进行自然村的专题研究后，得出的极为具体的日本农村基础社会结构论。该论断借鉴了英国的Le Play学派（P. Geddes）的方法，上述集团积累论是从C.J. Galpin、P.A. Sorokin、C.C. Zimmermann等美国农村社会学中发现的基本论点。铃木在参考其他各国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努力建立独自的“日本社会学”。当时，欧美的社会学大部分属于“分析个人心理式”的研究，但是，日本的社会学“不是通过将社会现象还原到个人意识”，而是“尽可能在现象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寻求说明的根据”，其研究的焦点在于“作为社会形态的村和家”。

第5章的“社会集团”，第6章的“社会关系”，第7章的“社会意识”构成了本书的基本内容。

日本的“社会集团”是指（1）行政上的地域集团，（2）氏子（神道教徒）集团，（3）檀徒（佛教徒）集团，（4）讲中（神佛祭祀）

1 自然村的精神

集团,(5)近邻集团,(6)经济上的集团,(7)国家设立的集团,(8)血缘上的集团,(9)特殊共同利益集团,(10)阶级集团。起源于明治以前的、自然产生的集团不断积累发展成第一社会地区·第二社会地区(自然村)。进入明治以后,在政府或全国性中央机构的领导、奖励、保护下逐渐壮大的集团主要以第三社会地区为根据地。据记载,第三社会地区受到进攻大陆和国家统治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国家服务的“人工构建”的新集团。

“社会关系”具有(1)地区性(近距离产生的相互认识),(2)全人格性(带有感情的全人格关系),(3)持续性,(4)集团型(社会生活以家庭为单位,并非个人)的形式特征。其背后潜藏着社会意识的强劲。铃木逐条分析这些普遍性格及其内容(习惯),通过具体研究借贷、赠答、援助、合作、交换劳动力、轮流制、宴请、庇护等习惯,日本农村的“关系模式”清晰可见。“实事求是地研究社会过程”,必须调查(1)村民集会,(2)共同劳动,(3)共同饮食,(4)祭祀,(5)葬礼,(6)婚礼等仪式。而且,当时的研究成果包括,飞驒的讲中集团、基于血缘的社会关系(加速自然村的分化)、共同劳动、首领—属民关系等。

铃木社会学中的“自然村的精神”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有关“自然村的精神”的内容将在第7章“自然村的统一性及其社会意识”中深入展开。铃木指出,自然村“是一个具有社会性的独立存在,所有社会意识在自然村内自由地发挥着作用”,这些社会意识的具体内容包括(1)崇拜氏神的制度,(2)共同祈祷以及村内事务的习惯,(3)土地公有。如前文所示,铃木列举了10个与自然村相关的社会集团,其中,他特别重视氏子集团。这表明铃木认为之所以无法将氏子集团与入村定居的人一视同仁,是因为“氏子身份”是共同拥有社会意识的必要前提。虽然在当时,氏神祭祀渐渐变成一般风俗,但是自然村的社会结构仍是“因氏神祭祀而存在”。

挡路防止恶灵入侵、驱虫、求雨、风祭等共同祈祷是为了祈求村落平安,因此,为了实现“自我保护”,即使牺牲其他村落的

利益也在所不惜。村民不顾个人利益，共同承担“村内事务”（修路、架桥、疏堤、修建寺庙神社、预防火灾）。这些习惯来自于“村落自治生活的需要”。这些村内事务的习惯已经超出了村落是生育自己的家乡这种地域社会的意义，衍生出了“对这片带有自己体味的土地的热爱”，通过亲自保护这片土地，从而加强“体验性情结的联系”。获取木材、薪柴、鲜草、饲料、茅草等资源的人会山^①实行的是“自给自足体制”，在这里交换经济无法得到发展，资源利用率极高。而且，“土地公有”制度培养了村民的连带意识，可以说，这种共同劳动的形式形成了独特的“公”。铃木认为，这种“公”意识以社会意识的形式扎根于村民心中，之后转变成了崇拜寺庙神社的情感，促进到了自然村内寺庙与神社的出现。

后来，虽然“自然村的精神”受到了各式各样的批评，但是铃木坚持认为“自然村的精神”不是“形而上学的神秘实体”，并指出，实证研究必须完整地分析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社会过程，“固有的客观性存在于制度与习惯之中”。换言之，制度与习惯正是“自然村的精神”的具体表现，集团固定并持续存在以后，制度会约束个人，社会关系重复出现并概念化后，习惯会限制个人。这种生活原理渗透到人们社会过程的“方方面面”时，便会产生一个超越个人、超越时间的共同体。

与行政村的独立性不同，自然村的独立性依存于“统治的自足性”（在“社会意识的自足性”的支撑下）。统治的主体不是自然村，而是各个集团。自然村的“精神”正是限制集团组织与机能（构成社会意识的内容）的行动原理。借用铃木的话说，“这只不过是处于历史发展中的村落在时间河流中呈现的一个横截面，构成时间河流的村落全貌才是一个精神历史或一组意义体系的历史性展开”。

第8章“关心共同圈”中会介绍“买卖圈”、“通婚圈”等内容，

^① 入会山，村或部落公有的土地，用于获取柴木、肥料用落叶等资源的山林。——译者注

这些都是超过自然村范围的“社会关系的积累地区”。

传统村落的共同祭祀氏神、整理部落林地等习惯进入明治时期以后，“给传统村落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原文出版于昭和初期，当时自然村的分化已经十分显著，许多村落已经追踪不到“原型”。第9章主要介绍村落转型的动向，总结为（1）水平的变化，（2）垂直的变化。

例如，（1）中包含了产业的变化，如农村工业化的进展、商人集聚地的分化状况。江户末期以后，新兴乡村小镇和集市村落不断壮大，明治维新以后，脱离自给经济、立志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户逐渐增多，于是推动了自然村内部的职业分工。随着与市场的关系变得紧密，村民接触城市的频率与兴趣参差有别。这导致了村民对城市化的态度出现了差异，也影响了自然村的社会性结合。

明治的大部分外币来源于生丝出口，从事养蚕与不从事养蚕的农户发生了分化，养猪合作社、果蔬供销合作社等各种农户组织的小合作社分别出现在自然村内，有时还超出了自然村的范围。铃木明确指出，单一的农事实行合作社有利于自然村的统一，是“理想的”形式，但他也无法隐藏崇尚实践的想法，认为完善自然村领导者与组织对自然村来说十分必要。

还有，作为（2）的例子，自然村内的评价基准包括家世（特权荣誉）、财力（资产）、才智（教养），“家世是过去力量的余力”而已。明治以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思想使评价基准逐渐倾向于个人，财力和才智也趋向优化。不过，据统计，农民中很少有人初中毕业，这表明“财力的形成影响着教养的形成”。铃木认为“农村萧条”的原因在于缺少才德兼备的领导者，他甚至一语道破，日本社会存在“过分信任与法制和农业相关的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倾向”。

仅仅靠耕种农业不可能产生财力的上下级分化。即使有人因从事其他行业而破产或发财，“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也不过是“诽谤嘲笑的对象”，因为这与“村落的道义”背道而驰。甚至地主—

佃农关系也受到“村落的道义”的约束。换言之，自然村中“垂直距离”的地主-佃农关系是产生“社会分化”的重要因素，铃木指出，这种关系也无法摆脱“村落的道义”的约束。

II

铃木荣太郎（1894—1966）于192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之后进入校风完全不同的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25年，就职于建校仅2年的岐阜高等农林学校，在受到新学校校风的影响，铃木埋头研究日本的农村社会学，历时15年于1940年完成了著作《日本农村社会学原理》，之后任职于京城帝国大学。1947年成为北海道大学的教授。在1958年辞去该校教授一职之前，其巨作《都市社会学原理》（1957）问世。他在与病魔作斗争的同时，花了10年时间创作了这部巨著，完成后又立即执笔构思“国民社会学原理”。铃木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研究，然而遗憾的是，疾病最终夺走了他对研究的热情，逝世后，布施铁治等出版了《国民社会学原理笔记》。铃木很少发表论文，他毕生撰写了社会学三部曲，努力创建立足于日本现实的社会学，铃木带着国家论的研究课题离开东京，来到京都求学。不过，他到岐阜高等农林学校任职后，在与该校校长和农业经济学专业的同事们进行研究交流的过程中，决定以长良川流域山村的实际调查为出发点，转向“实证”研究日本农村社会。这里提到的“实证”研究并不是以涂尔干学派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实证研究，更不是主观主义解释的产物。为了确立“与农民共同担忧，共同思考的学问”（“农村社会研究笔记”《著作集IV》），通过审视现实，站在摸索农民·农村社会内部的视角，创立“可调查”的方法。

1920年到1925年，美国农村社会学得到了政府的援助，倾向于强调科学主义。铃木回忆说，“当时，我一直嘲笑（日本的）农村社会学在文化科学整体中占据的毫不起眼的位置以及其不充分的科学性”，自己只不过是刚好任职于一所与农村相关的学校，才

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另一方面，竹内利美追述道（竹内 1971），铃木和藏内数太、田边寿利一起批判当时学院式的社会学形态，立志于“发扬新的实证精神”。而且，铃木离开东京后，心里感到非常无助。“虽说要科学地实证地研究农村社会，但当时并没有清晰的中心课题和具体的方向。虽说要学习美国新式的科学社会学，但两者意义完全不同，根本无法着手”（“我国农村社会学的回顾与展望”《著作集Ⅳ》）。

在这样的情况下，铃木选择了柳田民俗学的方法，也就是实证的方法。1910年发行了《时代与农政》，开始策划组织的成立，1925年杂志《民族》创刊，除了前面提到的田边之外，还聚集了有贺喜左卫门、冈正雄、奥平武彦等朝气蓬勃的志同道合之士，他们开创了“新实证人文科学的综合场所”，立志于实现柳田民俗学的新发展。于是，农村社会学与农政学、农业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的各种研究合作，共同开展农村的实地调查。与此同时，关东大地震（1923年）发生后，东京市成立了都市问题调查会，率先开展城市问题的实证研究。关于当时铃木的研究态度，塚本哲人说道，“研究的对象不是外国，而是日本，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或有权有势的掌权阶层，而是贫苦的老百姓。而且，可以说其基调是在野人士的志向，即研究调查真正的现实状况，亲眼、亲耳、亲手去证明事实”（塚本 1975）。毋庸置疑，这与柳田民俗学的基调相一致。

III

《日本农村社会学原理》成为了后来日本农村社会学的路标。与其说是孤芳自赏，倒不如说，它和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美术史专业的有贺喜左卫门在同时期提出的家联合论堪称双绝，二者是相互切磋的关系。铃木认为，有贺论述的南部二户郡石上部落大家斋藤家的同族集团是“特殊”的存在，是明治以后的文化基调，即平等主义渗透人心的结果，大家的“特权荣誉已很难得到承认”。换言之，铃木虽然承认作为社会关系各种形态的“基于血缘

的关系（同族关系）”和“首领属民关系”，但是他又指出，“家联合”会削弱村落的联合，使后者的各种关系“变得没有必要”。

由于铃木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比较普及的西日本，而有贺的研究对象是至今依旧保持低生产力社会经济结构的东日本，这种地域差异使二人对农村的理解产生分歧。后来，福武直基于这种生产力的视点，提出了“从同族联合到讲组联合^①”的变动论。但是，竹内强烈批判福武的生产力视点毫无实证根据，并提出“村落机能论”，即，即使在“落后的”东北农村，同一村落内也同时存在同族的家联合、讲组的家联合、甚至于具有个人视野结构的“近邻关系”等各种关系，而且能够按照生活上的需要分别使用。

此外，铃木和有贺意见不一致的原因不仅限于地域差异，还出于历史态度和社会学观的分歧。铃木将同族的家联合与亲族关系区别开来，虽然他承认其属于“血缘集团”，但是仍然轻视其为“特殊”的存在。另一方面，有贺立足于家联合的内部，将其特征作为“典型”，采取重视时代继承，连续的“历史追溯式”研究态度，探究村落家联合的历史发展状况。他们二人的研究虽然存在差距，但也具有共通点。针对铃木，有贺共通的主体，生活论视角，高桥明善，布施铁治使用“庶民生活的创造性”、真人呈现的精彩的生活实事、“生活的理论”等表述对其进行了重新评价（高桥1975，布施1975）。

接下来将话题重新回到《日本农村社会学原理》。在自然村论的基础上，铃木用“扎根于时间秩序上的限制”的表述提出了“家族世代发展的周期性律动”。不过，铃木独创的理论构想，即律动论，最终还是没能从“自然村的精神”的静态概念发展成社会性变动论。联系家联合论，将律动论构想发展成家族-村落这一新的社会变动论，成为一个等待解决的课题。

① 讲组联合，日本村落家庭的联合方式之一，按同一宗教或同一地缘划分。——译者注

铃木并不认为“自然村”是自然的产物，也不认为其是一个实体概念。明治以后，“自然村”与国家的政策和军靴的声音一起发生变化，并被这两股力量重组。然而，农民自身同自然水土斗争的历史是村落本身的“公”，也就是说创造了自然村的精神。现在，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当务之急是保护水源·水系等，铃木一直关注的“精神”，也许可以推动“水源村落”的重生。

●文摘●

虽然村落中只有3、40户人家，但是，只要它还是一个村落，一定拥有一个独立精神的体系，维持村落建成以来的生命。人们坚决排除理性、感情、暴力等一切损害村落社会统一的因素……保证生活的方方面面保持正确的规范，不需要外界的强行要求或积极引导，也会自然而然深深扎根于村落。正是这种道义和生活规范，才是村落社会意识的内容。我将其称作村的精神。（铃木1968/Ⅱ：468）

●参考·相关文献●

布施铁治 1875“战后日本农村社会学的展开与农民阶层的‘生产、劳动—生活过程’分析视角”《社会、生活结构与地域社会》时潮社。

细谷昂 1998《现代与日本农村社会学》东北大学出版会。

喜多野清一 1968“铃木农村社会学中的村与家”《铃木荣太郎著作集Ⅱ》未来社。

松冈昌则 1991《日本农村的生活互助》御茶水书房。

铃木荣太郎 1969-1977《铃木荣太郎著作集》Ⅲ-Ⅷ 未来社。

高桥明善 1975“农村社会学中的生活研究与社会结构研究——方法的反省与展望”《社会、生活结构与地域社会》时潮社。

竹内利美 1971“探求的过程——到《日本农村社会学原理》完成为止”《铃木荣太郎著作集》Ⅲ 未来社。

鸟越皓之 1985《家与村的社会学》世界思想社；1993年增补版。

塚本哲人 1975“铃木社会学总体系化的指向——强烈的探究意志”

《铃木著作集》Ⅷ 未来社。

(松村和则)